



冯康 —— 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连载四)

汤涛 姚楠

改革开放的春雷过后，
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袭来。
当科研遇上了商品经济的波涛，
有人“跳海”成就了神话，
有人“失足”湮没于传奇，
他——作为一个另类的“弄潮儿”，
筹划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推波助澜，
一次与总理的世纪约见，
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写下了巅峰的符号，
影响持续了二十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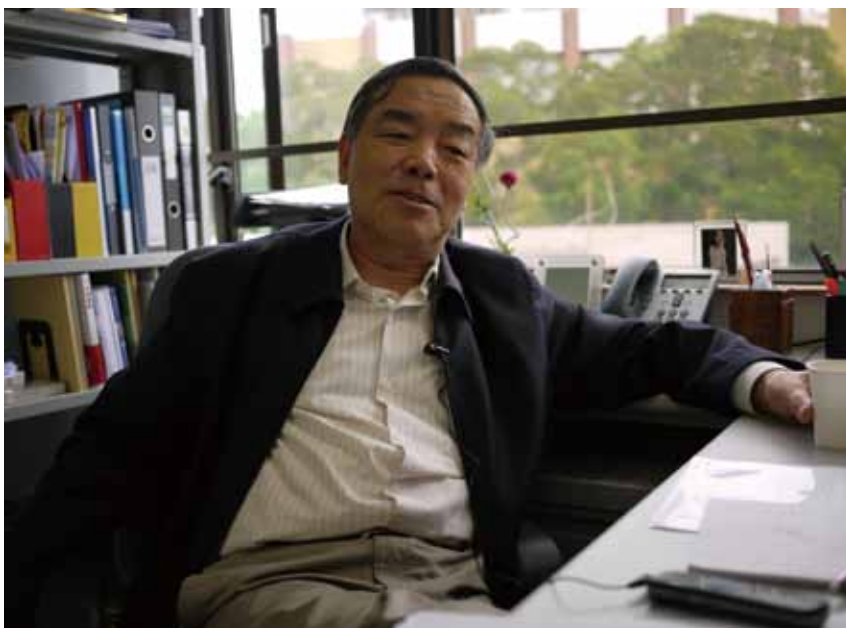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潮起潮落

1984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上续写着波涛汹涌与波澜壮阔。国门打开，商品经济的风迎面吹来。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国策出台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涌起了“经商热”、“下海潮”。一时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旧思维火花频现。各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评判再次洗涤了中国人



石钟慈院士接受作者采访

的心灵，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转型期。

在此之前，中国有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敲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大门。他们宁愿抛弃“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奋不顾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他们成为了中国科技人员“下海”潮中的第一批“弄潮儿”，他们也缔造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圣地”——中关村。

中关村“神话”

1983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技人员陈庆振“下海”创办了中科院在中关村的首家公司——科海公司。

五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师王洪德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四通报告”，创办了京海公司。他在报告中写道：“调走不行就借走，借走不行停薪留职走，辞职也要走，最后开除我也走”，表达了投身商海的坚定决心。

1984年5月，在美国留学的中科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万润南带着他“打造中国IBM”的理想与信心回来了，创办了一度引领了中国“打字机革命”的四通公司。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四通公司红极一时，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旗帜，也成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标志旗帜。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柳传志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联想公司。同月，中科院计算所与中科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以内部股份合作的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曾茂朝，总经理金燕静。

同样是11月，国务院还批转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一是把电子和信

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要放在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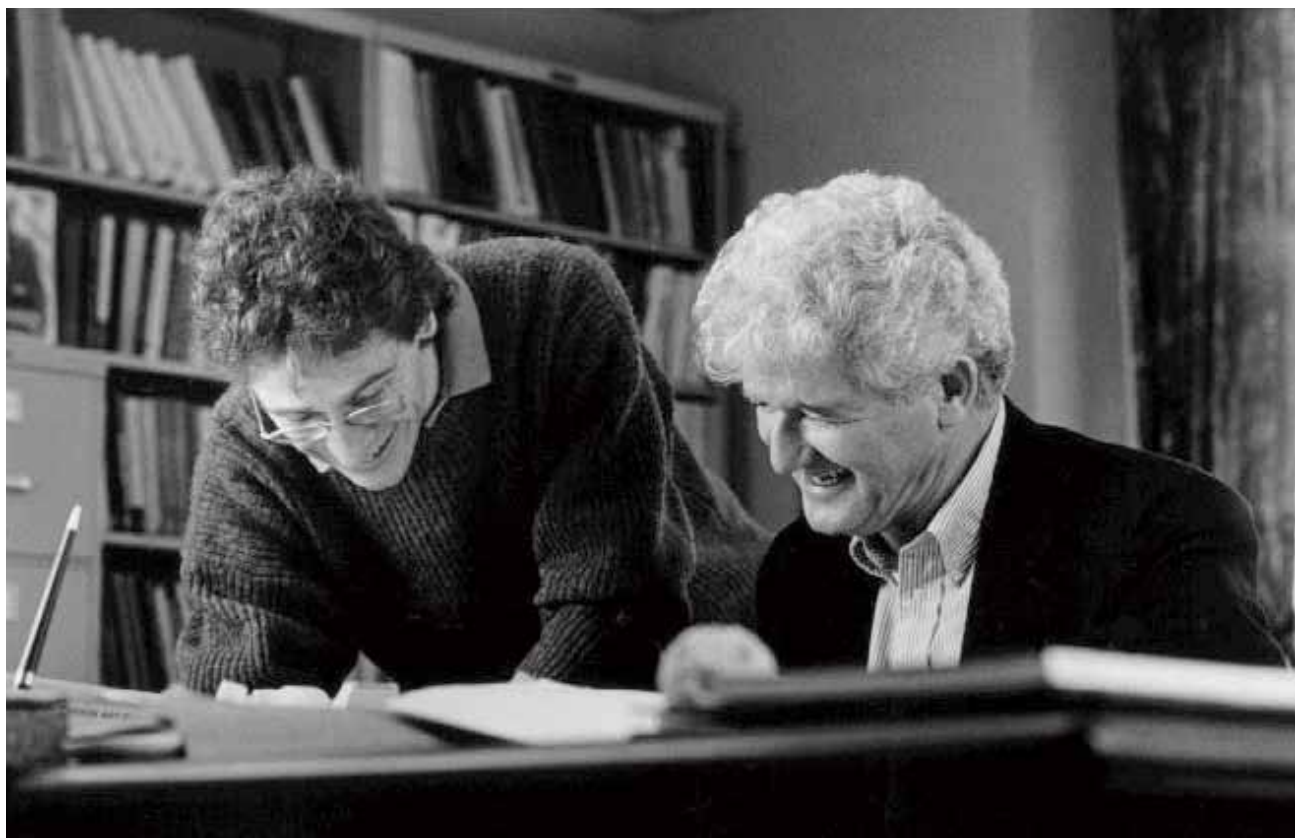
此后，中关村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资料统计，仅两、三年间，北京的科技民营企业就多达700多家。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热”使得冯康领导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受冲击。冯康对此相当反感，也极力反对。相反的是，计算中心党委对此却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为此，冯康与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刘廉儒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党委的支持与倡导下，1984年9月，中科院计算中心创办了鹭岛公司，注册资金324.6万元，以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主要业务，法人代表许昌平。此后，计算中心还相继成立了十多个小公司。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热”使得冯康领导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受冲击。冯康对此相当反感，也极力反对。

正如冯康所料，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游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水性良好”。没过多久，计算中心创办的一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相继亏损，纷纷面临倒闭的困境，而计算中心自身也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眼见亲手创建的计算机中心被商品经济的洪流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年过花甲的冯康似乎也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开始寻找“接班人”。他的目标人选锁定在六十年代被他派到科大、后接替他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石钟慈。



拉克斯院士（右）的 Lax 报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采纳

最后，他开始与科大的校长管惟炎接触，商讨调石钟慈回计算中心的事情。经过多次协商，1986年10月，石钟慈正式调回中科院计算中心。

石钟慈回到计算中心时也是面临着计算中心被公司债务拖累的“残局”，后来他甚至作为法人代表被告上过法庭。

1986年底，计算中心创办的最大、也是最有名气的鹭岛公司被四通集团兼并承包，至此计算中心总算摆脱了“一劫”。后来经过清理整顿、关停并转，计算中心逐步甩掉了一些公司的债务包袱，恢复到正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当初那些创造中关村神话的弄潮者，我们发现：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那些昔日

曾经在中关村叱咤风云的公司已经风光不再，那些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挥斥方遒的IT“枭雄”也是各奔西东。只有联想扛起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帜、屹立不倒，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

而昔日的柳传志也蜕变成为中国的IT“教父”。

与总理相约

冯康之所以被人们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因为他的确拥有过人的科学视野与战略眼光。正是这种战略眼光决定了他的思考高度，也注定成就了他的卓越、非凡。

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冯康来说，事业的发展并不算一帆风顺。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内忧外患”。外部大的社会环境中商品经济大潮的风吹浪打，内部改制后的组织架构下也时有传出不和谐之音。作为计算中心的掌舵人，他将会带领中国计算数学的这艘旗舰航船驶向何方？

此时的冯康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与“内忧外患”所羁绊，相反，他却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为整个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布局谋篇。

冯康深刻地了解科学和工程计算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发达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都相当重视。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和工程计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83



周毓麟院士在自己的书房里

年，他的好朋友，美国著名数学家彼得·拉克斯（Peter Lax）组织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美国宇航局（NASA）联合组成专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著名的 Lax 报告，强调科学计算在国家安全、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指出科学计算是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的关键。

美国总统采纳了拉克斯的建议，并从 1985 年起，政府连续五年，每年投入五千万美元，建立起五个科学计算的研究中心，配备超级电脑及设立全国性网络，以协助大学及研究机构计算方面的研究。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预算中，又把科学计算作为特殊扶持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用来支持科学计算研究中心的建立及加强各学科中科学计算的力量。

中国虽然早在 1956 年的科学规划中已经将计算数学列为重点，但始终都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重视。1986 年，

中国在制定“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时，初稿中也没有列入发展科学计算的相关内容。

冯康获悉此事之后，立即联合周毓麟等其他老一辈科学计算专家，于 1986 年 4 月 22 日写了一份“紧急建议”，递交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其中，他将拉克斯等写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重要内容翻译成中文，作为建议书的附件也交给国务院领导。

周毓麟，1945 年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1946 年开始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旁听陈省身教授讲课。周毓麟每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身的注意。一次，陈省身与周毓麟在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讲课你能听懂吗？”周毓麟回答听得懂。陈省身又仔细询问了他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后来，陈省身竟然破格让

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拓扑学研究。1949 年后，周毓麟先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1954 年秋，周毓麟和北京大学同事张芷芬等一起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负责接待的是 1950 年就到苏联留学的黄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张芷芬填报的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就拿起了主意，说：“周的数学基础好，就学偏微分方程，张就学常微分方程。”就这样，黄敦的一句话决定了两个人的终身职业。周毓麟的导师是国际著名女数学家 O.A. 奥列尼克，据说当时她比周还小一岁，所以开始不太愿意收这个徒弟。周 1957 年获物理数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被公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工作，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数学家们不断引用。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不久，周毓麟 1960 年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为了国家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始了新的征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周毓麟的名字从那时起突然在数学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在主持核武器数值模拟和组建计算科学队伍等方面贡献突出，以及他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离散泛函分析领域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工作，他于 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 1997 年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这份“紧急建议”的报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关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毓麟两位数学家。

这份“紧急建议”的报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关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毓麟两位数学家。于是，冯康和周毓麟得以在中南海向李鹏当面陈述中国发展计算数学的重要意义。后来，国家采纳了冯康等人报告中的建议，并在国家“七五”